

造磚者言

——香港文學資料蒐集及整理報告(以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為例)



盧璋璽，筆名小思、明川。1979年起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，2002年7月退休，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。

緒言

二十多年來從事香港文學研究，都屬我私人的、業餘的作業。為甚麼叫私人、業餘作業？那只因我幾乎全用了私人時間、個人資源來運作。除了退休前最後一兩個學期，我在中文大學中文系開過有關香港文學研究的課外，我沒在課堂上講過香港文學。多少年來影印資料、購買書刊舊書陳報，甚至連抄寫的資料卡片，我都用自資，沒用過公家一分錢。直到1998年，我和黃繼持先生、鄭樹森先生，才先後獲得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、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，出版了幾套資料參考書⁽¹⁾。要把材料公開，一直是我們的心願，但這類書沒有銷路，很難出版。適逢有些資助，才能聘請人手，助我在檔案櫃中，整理浩瀚文件，選出可用的材料。又用三人業餘時間、精力，完成採料工程，並邀得出版社合作，塵封在我書房中的部分文案，才得見天日。

可是，得見天日的資料，實在太少。我深信經過篩選，必有遺漏——篇幅所限、三人觀點有異，別的研究者可能認為有用的，我們未必採用。面對還未面世，又是我辛苦尋覓，分針寸縫而成的卡片檔案，深藏在文件櫃中，未能方便他人，我實在萬分焦急。幸而在我退休前⁽²⁾，得到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全力支持，成立了「香港文學研究中心」及「香港文學特藏」⁽³⁾，讓我安心把所藏的書刊、檔案交出，經過圖書館努力不懈的支持，已把所捐的香港文學、文化書刊編號入藏，又

將各檔案編排掃描上網。⁽⁴⁾

可是，我還有些心願未了，必須細作交代。

二十多年所尋索的資料，是經過我獨力分針寸縫，抄卡分類入檔的。（我初進入香港文學研究範圍時，科技支援十分貧弱，影印機用藥水濕紙，為怕褪色，乾紙出現後，我只好把資料全部重印。還沒有電腦可用，我就以手工作業抄卡。）為了方便自己記憶，分類憑靠自己腦中藍圖，我很清楚它們的安排，是有條理，而又互有關連的。就是書刊分類上架，也排列妥當，我可以從層層疊疊書架中，隨手抽取要用的書。

我捐出了書冊資料，圖書館必須聘請研究助理人員幫忙。他們是第一批「外人」接觸那些資料，一看之下就產生了許多疑問，這才使我反省多年來所用方法，只有我自己明白，在許多人眼中，實在十分繁瑣蕪雜和凌亂。因此，有寫出整理報告的必要，以便日後的使用者，清楚我的處理手法，和許多值得注意的地方。更重要的是反映我在搜尋資料過程中有何得失。

一 檔案設計參考

1. 阿英《中國新文學大系·史料、索引》⁽⁵⁾

阿英的編選是依照大系的編輯計劃進行，我卻沒有任何計劃框架，最初只就手頭積疊的材料，大略分類。日久積存，大略分類就出現問題，這時候，大綱目必須清楚，我參考了阿英的方法，最明

顯可用的是：「會社史料」、「作家小傳」、「史料特輯」、「創作編目」、「雜誌編目」，合共五項。但就依此五項，我仍需依自己擁有的資料情況，有所更改。其中「會社史料」一項，我沒有辦法如他一般，有許多會社簡章、宣言、發刊詞可選，只有收集報刊所載社團各種活動記錄、事後有關人士的回憶等零散資料。（有些社團成立宣言，往往不見於當年本地報刊，反見於日後的回憶者記錄中。）「作家小傳」一項，在劉以鬯先生編的《香港文學作家傳略》⁽⁶⁾未出版之前，根本不易找到足夠材料，我無法在短期內做他們的小傳。「創作編目」一項，阿英也說「恐怕有若干脫漏」、他又沒有訪問圖書館，我相信不周全的地方很多。以我個人之力，只好以手頭有的、擺放在書架上的書籍為主，並無一一編目。「雜誌編目」一項，則先做了蕭乾楊剛編的《大公報·文藝》副刊、戴望舒編的《星島日報·星座》副刊、茅盾薩空了主編的《立報·言林》副刊。目前大概已按序上網了⁽⁷⁾。後來雖然不斷增加了些重點報刊，但嫌數量不足，編目的意義不大。至於雜誌，由於個人蒐集未全，而各大學圖書館有藏的，又不必太急趕做，故注意力只集中在報紙副刊上。

2. 朱自清〈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〉⁽⁸⁾

由於阿英已理解五四後二十年的文學發展情況，且只重視某些文學主流及點出具代表性向、政治派系主張甚強的實績，故他開列的綱領很大，且有備而設。在研究開端，我對1949年以前的香港文藝面目，可說所知不多，一切只是走一步見一步景。經過十多年的資料積存後，他這個派性主觀很強的綱目分法，我已無法用得着。朱自清遺稿〈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〉，給我很大啟發，他以史的發展為主軸，以當時作家作品、文學現象、論爭、批評理論等配合，呈現了現代文學初期的發展面貌。特別在總論部分，他利用史料與作品、理論與運動、社團與派系等各種互動，給本來錯綜複雜的文學生態一個客觀評介。我可借鑒的地方很多。但由於我還未能做到評論部分，也沒法敘述歷史過程，只能散件收集，這當然不易給研究者完整印象。不過，這〈綱

要〉取材的細密，客觀的分析，重視社會背景及影響，都成為我蒐集資料及分檔時，謹記於心的要素。

二 我的設計

我蒐集資料的來源，最初是以香港報刊為閱讀目標，既是說一切在報紙上出現的文藝事件、活動、作品等記錄，無論詳略，不計輕重，都立刻複印存檔。

1. 分類形式

「人物檔案」較容易處理，見一人即以姓氏漢語拼音開檔，如同一活動，有十人參加，則手抄卡片記錄收入其他九人卡檔中。在未有電腦代勞前，此乃笨方法，也是我想到的唯一方法。「社團組織」，也是見一組織名字既建一檔，如一組織中下再分小組，則在大檔中再分細檔。例如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」這檔下，就分出與該會有關的刊物：《文協週刊》、《中國作家》、《文藝青年》，與該會有關的小組「文藝通訊部」（簡稱文通）。該會戰前戰後組織不同，但性質相同，故仍同屬一大檔。「方言文學」討論，本屬文協舉辦的活動，但因已成獨立文學專題討論，則另開一檔。有些小社團活動不多，出現資料不足成檔，則只入卡片檔。例如1947年出現的「芭蕉社」，則只見小訊，出版林友蘭翻譯的《凱旋門》、侶倫小說集及陳子多漫畫，其他資料未見，故只見於卡檔。

「文藝論爭」、「文學運動」、「報紙副刊」、「報刊歷史」均易分類。「文藝活動」本按年份分檔，如遇大型而連續性的活動，例如魯迅逝世週年紀念，每年均有大型紀念活動及在報刊開設特輯，分量頗多，則在「魯迅」檔中另開一小檔。「社會背景」一項，本無意收集，但因這段時期的現代文學創作與活動，與社會事件、中國政治情況、港英殖民政策，一一有着密切關連，又由於我是逐日翻閱報章，難免會同時接觸時事及社會事件，才發現許多文學作品、文藝活動，緊扣着社會脈搏。孤立地閱讀作品，既無法理解作品作意，更不易看到當時文藝發展的全局。例如1949年4月黃秋耘寫的〈吳深的悲劇〉，就反

映了當時警察追捕小販的情況，在報紙上有詳細新聞報道(9)「戲劇、劇社」、「電影」、「漫畫」、「木刻」等藝術活動，也與文學息息相關，且當時的文化界互動情況十分普遍，各項活動合起來，就可反映一個較接近完整的文化生態，故亦開列成類。

各項中，我特別重視「報紙副刊」，其中又以文藝性質的週刊、雙週刊或文藝團體的社刊為收納重點。例如戴望舒主編的《星島日報》副刊(星座)、茅盾主編的《立報》副刊(言林)、蕭乾、楊剛主編的《大公報》副刊(文藝)、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」會刊《文協》、「中國文化協進會」會刊《文化界》、葉靈鳳、陳君葆主編的《華僑日報》副刊(文藝週刊)(1944~1945年)等等，我都先做了目錄索引(10)。部分副刊原文，我也複印存檔，為的是方便自己查閱。

2. 作家作品、資料蒐集

我沒有設「作家小傳」一項，但卻有「人物檔案」。我不用「作家」一詞，是因為在蒐集過程中，發現這段時期，許多作家另有職業身份，他們可能從事不同行業：編輯(流行小說作家也多兼編輯之職)、記者、教師、出版人、畫家、演員、導演……或為求生計，或為政治活動，他們散處於各行業中，因此，嚴格來劃分，可以說香港沒有專業作家。我改用「人物」這詞彙，其實也不理想，最切合含意的，應該用「文化人」一詞。

文化人的活動、作品、訪問、別人的評論，只要出現在報紙雜誌中，我就會先抄入卡片，部分作品則複印。(早年圖書館較容許複印舊書報——現在圖書館所藏舊書報，已不許複印。正因如此，載入網頁，是刻不容緩的事。)除了當年可見資料外，還有近年出版的文化人回憶文字、社團、報社全人整理的紀念書刊，都提供了寶貴材料。凡見有關材料，題目、出處，我都抄在卡片上入檔，故卡片資料遠較檔案夾豐富。

此外，作品單行本，也應為重點。可惜我購買舊書刊的行動起步太遲，加上香港舊書供應不足，能買到的書不多。且我尋舊書行動並不積極——這

與我個人態度有關，我沒有勇氣開口問人要書買書，例如當年我知道陳君葆先生、高貞白先生藏書豐富，他們曾說部分可送給我，我就是不敢要，因為那時候只為我個人研究，私人佔有，不大好。正因如此，高貞白先生去世後，他家人說有些書和信札可捐出，我趕快介紹了香港大學圖書館負責人去取。我又不好意思向朋友問書價，黃俊東先生是香港重要藏書家，他移民前，說要清理藏書，陳無言先生藏書也多，他晚年有病，要把書出售，我都無法開口跟他們說要買書，於是錯過許多機會。另外，我也沒有遠赴外地圖書館尋書，因為我一直認為先做好本地報刊書籍資料，較為理想，反正他日作專題研究的人，會按各圖書館索引去找，這就是造成書刊收藏數量單薄的原因。

文化人口述歷史，也十分重要。現在人人都說要「搶救活史料」，二十多年前我就知道這是必須趕快做的事，可是力不從心——沒時間，沒人手，平白讓許多寶貴活材料在眼前溜走，一切無可挽回。

做口述歷史的訪問，與一般訪問不一樣，事前事後都要做許多準備工夫。對受訪者的行事創作，應有一定認識，設問必須刨根究底，問出一些文字沒有記載的材料來，事後還要校訂、查證受訪者有無誤記，這一切甚為費力。在八十年代初，我爭取機會，在課餘靠個人能力，訪問了好幾位作家，例如平可、謝晨光、侶倫、徐遲、慕容羽軍等先生，可是，由於沒有時間與助手幫忙，直到今天，我竟仍未把錄音化為文字記錄。還有一點，老一輩人，不習慣面對錄音機講話，我只好筆記，有些更不能當面做，默記於心，回家再寫在卡片中。更有些老作家不輕易接受訪問，例如謝晨光先生，他最初拒絕見我，後來跟他建立了尊卑友誼關係，多見面多聊天，他才信任我，但對自己早年情況仍絕口不提，這種記錄當然稱不上合格的口述歷史。又例如侶倫先生，他對我很信任，有些他親手裝幀的舊作都送給我，也常與我聊天，談及許多他個人的往事，但他卻不肯接受口述錄音訪問，並一再強調我們談的事，不能公開。這類情況，我就連卡片也不敢寫，只記在心裡。

3. 相關人物、社團、機構、背景資料

有人看到我蒐集的書刊，覺得很雜，除了作家作品外，竟有許多看似與香港無關的文字，也有些不該列入香港範圍的作品。

我在上面說過來港小住、過港忽忽的文化人很多，職業、身份各有不同，但留港期間，為了生計，或為了興趣，或為了政治任務，都會在報章上撰文，及參與過香港文化活動。他們許多機會聚在一起，有許多共同經驗。例如：蕭乾、徐遲、林煥平、馮亦代、黃苗子、郁風等人都曾參加過「文協」，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，他們紛紛出版文集，其中回憶文字，不約而同寫到那段時候的事情，就可供互相參照。不過要記住幾百個人的名字和彼此關係，真不容易。

研究早年的香港文學及文化活動，等於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一樣，絕不能忽略政治因素。香港這個殖民地，早已成為左右派及許多旁支勢力建立勢力的角力場所，此外，還夾雜了英國政府的微妙干預與兩派互相制衡的利用。左右兩派在香港往往利用各類文化社團，推動宣傳思想，吸納群眾，報刊更成重要陣地。不同政見的政客、軍人也紛紛爭取在社會曝光的機會。而港英政府當然無孔不入地細加監視，搜集資料，匯報英廷，制定策略，在複雜情勢下，制衡各派系，以保治權。因此，在這段時期的眾多相關人物、各個大小社團、各種表面似與文藝無關的機構，我都視為蒐集對象。例如《廖承志傳》⁽¹¹⁾、《一代名將蔡廷鍇》⁽¹²⁾、《葛量洪回憶錄》⁽¹³⁾、《南方局領導下的重慶抗戰文藝運動》⁽¹⁴⁾、《南方局黨史資料文化工作》⁽¹⁵⁾、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成立三十週年紀念集》⁽¹⁶⁾、《香港南方學院紀念文集》⁽¹⁷⁾、《達德學院建校五十週年紀念文集》⁽¹⁸⁾等，這些材料，儘管其中可能只有片言隻字與香港有關，但配襯、對比、關聯起來，在在都能反映當年香港的文化面貌狀況。

在團體及組織檔中，有些看似與文化活動無關的，例如「香港學生賑濟會」、「香港業餘聯誼社」，因有許多文化人曾參與其中，背景又與某些派系有關，就應收集。又例如在1946年成立的「南僑編譯社」，是由陳嘉庚資助，專為南來作家出版通俗讀物

的機構，由於活動不多，我只存卡檔而無資料檔。

4. 通俗文學、古典文學的處理

阿英在《中國新文學大系·史料、索引》的〈序例〉中，配合當時編輯計劃與文藝觀立場，完全沒有提及通俗文學，更稱古典文學為「新文學的反動」⁽¹⁹⁾。但朱自清在〈綱要〉第一章中，作為背景材料，比較客觀，就提及古典小說和「禮拜六派」。但這兩種處理方法，對我的蒐集來說，都不適用。

在香港報章的副刊中，可以看到通俗文學的分量很多，也就是說通俗文學所佔空間很廣。古典文學例如小說詩詞，也有一定量的作者和讀者。特別在四十年代末以後，通俗文學更成為報刊文字主力。（到了七、八十年代，甚至連純文學作品，也得寄身於雜亂的副刊中。）我想舉出一個很顯明的例子，二十年代已經從事純文學創作的黃天石，到了三十年代中葉，就改用傑克為筆名，在報上寫通俗小說，成為流行小說家⁽²⁰⁾。他在五十年代，創辦及主編《文學世界》，可見他念念不忘純文學的推介，他的遊走於通俗與嚴肅之間，也說明了在香港許多作家的處境。還有一點，我以為研究一地的文學，應關及文化背景。廣義的文學，可為此提供一定材料。因此，我也蒐集流行文學作品。早十多年前，學院派可能仍有人不接受，不過，我還是「見到就收」，且存放起來，以便研究者的需要。

另外，早年的報紙副刊，多以「諧部」為主，其中最具地方色彩是「粵謳」。粵語寫的詩詞、小說、散文、評論，幾乎成為副刊的主體，內容多即時刻畫本地生活面貌，反映及批評時事，這是值得研究者重視的⁽²¹⁾。（五、六十年代的專欄中亦多反映社會現況的作品，也未見有人整理。）

至於古典文學作品，我蒐集不夠多，但中文大學中文系的黃坤堯、王晉光已在全力收集整理，這種分工，既專業又集中，對資料散落的研究，是最理想的。

5. 文學現象、論爭、理論、討論

凡有不同文藝派別，自有不同理據，分歧必生

討論，故朱自清很重視當時的文藝論爭。我研究的範圍正值左右派文藝觀爭持不下，國難當前的時候，論爭特別多，例如「抗戰詩歌論爭」（1937～1939）、「抗戰文藝的形式與內容論爭」（1938～1941），是由內地延伸至香港的討論。「汪派『和平文藝』論爭」（1940～1941），是針對汪派所提和平口號而來。「關於新式『風花雪月』論爭」（1940～1941），是左右派在香港全力對抗的一場論戰。這都是重要文藝面貌，也幫助我弄清楚一些文化人的立場。又如四十年代末在香港掀起的「方言文學」試驗與討論，一時熱鬧非凡。社論、小說、詩歌、散文，都試用廣東話書寫，也有專門理論，一切追步內地左翼推動的文風。這些檔案可助我們瞭解香港與中國文藝的千絲萬縷關係。

6. 出版社、叢書的聚合

書刊在架的編排方法，我並不單依作家或作品的漢語拼音或筆劃序，而是部分按出版社、叢書類排列。例如：「受匡出版社」、「工商日報出版社」。此種情況在四十年代以後，出現更多。例如「高原出版社」、「人人出版社」、「亞洲出版社」、「自由出版社」、「新民主出版社」、「友聯出版社」、「今日世界出版社」等(22)。如此編排，可以一目了然，不同立場的出版社出了甚麼書，反映某時期、某派系的出版態度，而我也可躲懶，不必編目。（這種分法極不按圖書館的分類守則，各書入庫藏後，排法已改變了。）叢書類例如《北方文叢》、《南方文藝叢書》、《新兒童叢書》等，同樣可以反映出版社取向。（五、六十年代的《創墾小叢書》、《南苑文叢》、《現代文叢》亦作如此安排。）這種排法是方便我自己容易找書，但入庫後，就完全拆散了，電腦索檢只可查出叢書目，無法索檢出版社名下出版物，這較可惜。

通俗小說，我本也歸成一類，隨手在架上就可抽取翻閱。許多作者為了謀生，化名賣文，除極受大眾讀者歡迎的如傑克、俊人、孟君、鄭慧、依達等，足可按作者排列外，其他實難一一細分。可是入庫後，按圖書館分法拆散了，就出現問題。日後研究者既不知作者名字，又無書名追查，根本無從

掌握當時通俗文化面目，入手就不容易了。

三 未捐出的材料

多少年來積存的研究資料，除了已捐出的書刊、檔案外，尚有下列幾項材料未捐出來：

1. 資料卡片

研究搜尋初階，我全倚靠把所見資料抄在卡上。當年複印機用藥水濕紙，複印費用也不便宜，有些報上短訊只得幾行字，捨不得複印，只好手抄。如遇文字數量較多的，仍複印了再剪貼在卡片之背。另外，翻閱館藏報刊，見到相關材料，為了省錢，有時也只抄題目、出處、日期，以便日後再查閱或複印。如果立刻複印了歸檔的，就在卡片上再用紅筆打個星符，表示已存。另有些受訪者口頭提供的材料，十分零碎，我只抄入卡中，置於該人名下，例如謝晨光的資料。是故卡片遠比檔案夾的資料多。

卡片分項大致與檔夾相同。上文曾提及有些小社團、出版期短的報刊，並不設檔案夾，只見於卡片。故卡片較全面反映情況。

文化人只要曾出現報刊或在其回憶文字中提及來港，我就按漢語拼音序設卡，在首卡會寫上生卒年、筆名。可惜當年設卡時，文化人小傳材料未如今天充足，特別筆名部分，十分欠缺，後來尋得新料，又因事忙，未加核實，沒有一一補上。他日用卡者，必須小心查證及補回。

2. 香港淪陷時期書刊資料

香港淪陷後，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，留港的文化人仍有活動，包括繼續辦報，編輯、出版書刊，後來回憶文字也不少。我整理了三、四十年代的材料，寫成十幾篇文章，重要的人物、社團都包括在內，又出版了戰前戰後的文藝作品資料集(23)，就獨欠淪陷時期這部分。主要原因有二：其一是有某些人物是否「落水」？能否以漢奸視之，我還未掌握足夠資料，很難評斷。這段時期的文學作品，並未

截然斷層，有些仍是1940年的延續，可是的確又有些為寇宣傳之嫌。如何選評，怎樣處理，我和黃繼持先生、鄭樹森先生曾幾番討論，仍未有結論。本想待一些日子才細加考慮，反正時間是有的，不必趕急。誰料黃繼持先生退休後不久遽然去世⁽²⁴⁾，令我們大受打擊，甚麼工作也停下來了。雖然好幾次與鄭先生談起，都說這段時期不能空白，但拖拖延延，還是無法落實。為了這件未完的事，我只好留下那些材料書刊，以備日後應用。

3. 社會背景資料

閱讀舊報，往往順便翻閱當年社會新聞，因為有許多事件都與文化活動有關。特別在四十年代，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時，社會的反應十分微妙。我最初都忽略了，常常在某些事件結束後，才發現蛛絲馬迹早隱伏在幾個月或一兩年前，幸而記憶力好，記得曾看過，只好再翻舊報，尋出事件發展過程。例如香港政府為針對左派社團活動，修改〈1920年社團法例〉，在立法局臨時動議首讀〈1949年社團法例〉⁽²⁵⁾，我初讀時就沒注意其嚴重性，等到在我研究範圍內的文藝社團被拒絕登記，並遭解散處分，才醒悟過來，只好重尋〈社團法例〉通過、左派反對、右派贊成等等資料。從此，「言論檢查」、「便利維持公眾秩序與公安條例」、「人口登記條例」等材料檔案夾，成為不可或缺的參考。到九七前後，這些史料提醒我：歷史原來如此重演，鑑古知今，我捨不得它們離開，暫時仍留在書房裡。

4. 書信

這都是私人書函，除了本港文化人外，還有許多內地、國外的文友的書信，都屬私隱，為尊重來函友人，部分我認為不宜公開，應如何處理，至今未想到妥善辦法。

5. 照片、錄音、錄影

香港文化人的照片，很早我就有意收集，例如謝晨光、平可、柳木下、陳崎、三蘇、司馬長風等照片，應算十分珍貴。但由於當年相機不如今天方

便，不會隨身攜帶，許多時錯失良機，例如司馬長風先生在一次茶敘中，忽然說起要介紹我認識周鯨文，當下就立刻去「時代批評社」，我沒帶照相機，自然無法拍照了。有些照片卻又是意外得來，有熱心人寄來⁽²⁶⁾、有自舊書店購入⁽²⁷⁾。這些照片加以文字說明後，自會捐出。

錄音及錄影資料並不多，整理後就可捐出。

四 檢討及補充

1. 由於所有資料本來只供個人研究之用，隨手寫下的字條札記，有時夾在書中，有時插入檔案夾中，偶爾也會寫在書頁空白處。例如同時四本書提及一人一事，我就會在一本較重要的書中，用小貼紙說明其他三書何頁與此有關。別人看來，有些凌亂，但互通連繫，方便參考。可惜這些小紙條，在整理入藏時給撤掉了。

2. 打開檔案櫃，內行人一定奇怪，何故在我研究範圍外的作者——1949年以後，直到最近的香港文化人，都開設了檔夾，而內容又十分單薄？這是我過分「貪婪」的表現。日常在報刊上見到許多文化活動，又有許多作者記錄，我想像日後自己可能會把研究年限推展，更不想資料截斷在1950年，於是就隨手為那些文化人開檔了。這「人物檔案」當然不齊備，未經我深入核實的很多。在此必須聲明，1950年後的一切檔案十分簡陋，只盼他日研究中心或圖書館會有資源，聘請專人續成其事，讓檔案繼續生長下去。如果各研究者蒐集了有關香港文學資料，寫成論文後，用過或剩餘材料，大可送給資料庫，以便後來者。

3. 又其中最令我心痛的是失去十三妹及三蘇兩個檔案，後悔當年不留底就輕易把它們借出，而兩位借用人後來竟說失掉了，沒歸還給我。

4. 筆名的追查，也是研究香港文學最頭疼的一關。目前做口述歷史必然的一條問題是請受訪者講出用過的筆名。可是幾乎每個受訪者都會回答說：「太多了，一時記不起來。」著名常用的，大家都知道，不常用的，竟連作者自己也忘記了，還有甚麼可說。還有一些自隱其名、縱然出有無數作品，從

此就埋沒了。靠第三者記憶也未必可信，同輩同行的記錄會好些，但仍需小心處理。

5.我依靠報刊取材，也有缺點。見報多並不等於重要人物，社會活動家往往佔去篇幅，卻沒太大影響力，沉潛的作家又未必見報。記者筆錄、手民之誤、社團自己發放消息、預告節目後並不落實、館藏報刊闕漏等等，都令檔案冊呈現出來的狀態不盡不實。

結語

接近三十年的苦苦尋索，我對香港的文學(或應該說文化或文藝)的所知，好像比許多人多些，正因這「多些」，更使我常陷於徬徨中。我思索：究竟香港文學史該有一個怎樣的面貌？它的內涵應該有甚麼特質？如何處理它與別地不同的身世帶來的複雜性？早年滬省港澳的相連關係，哪種創作意向對香

港影響最大？中國文化人在港的寫作，應否列入香港文學範圍？本土意識應否成為評鑑重點？究竟我所找到的材料有多少屬於真實的香港文學？……種種疑問，使我困惑，無法抽身，從一個較高的視角去審視香港文學。我愈來愈覺得自己只適宜做一個資料搜索者，先做好磚，作為建構香港文學史的材料，以待有心的研究者應用。我在搜尋過程中，盡力避免個人愛好傾向，遠離主觀評鑑標準介入，一切以俟來者。

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於2005年6月把我蒐集的資料檔案上網公開啟用，完成了我多年來的心願：「資料公器，人人可用」，但自知那些材料雖然得來不易，卻仍多疏缺，希望後來人多加照拂，補其闕漏，讓館藏日豐。

2002年11月初稿

2005年4月修訂

(本篇標題書寫：秦嶺雲)

【註】：

- (1) 獲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資助出版的作品資料集有：《香港散文選：1948~1969》(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香港文化研究計劃，1997年，初版)；《香港新詩選：1948~1969》(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香港文化研究計劃，1998年，第1版)；《香港小說選》(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香港文化研究計劃，1997年，初版)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出版的作品資料集：《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：1927~1941》(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1998年)；《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(1927~1941)》(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1998年)；《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：1945~1949》(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1999年)；《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：1945~1949》(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1999年)；《香港新文學年表(1951~1969)》(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2000年)
- (2) 我於2002年8月退休，香港文學研究中心成立於2001年7月
- (3) 香港文學特藏成立於2002年12月
- (4) 各報刊可見於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之香港文學資料網，各檔案資料於2005年6月啟用
- (5) 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第十集，阿英編選《史料索引》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，1936年2月15日
- (6) 《香港文學作家傳略》市政局公共圖書館，1996年8月
- (7) 各編目索引現已見於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文學資料庫網頁，還有其他文藝刊物目錄索引均陸續見於網頁，更有全文圖像，可供閱讀下載
- (8) 《文藝論叢》第十四輯，上海文藝出版社，1982年
- (9) 見《華商報》1949年4月11日，頁4《為逃避拘捕墜樓身亡——小販吳森一頁血淚史》
- (10) 此等目錄索引現多已上了中文大學圖書館網頁
- (11) 鐵竹偉，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，1999年7月
- (12) 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等編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1月
- (13) 亞歷山大，葛量洪著，曾景安譯，香港華風書局，1984年9月
- (14)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，重慶出版社，1989年2月
- (15) 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，重慶出版社，1990年6月
- (16)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，1978年12月
- (17) 香港南方學院校友會編，1993年11月
- (18) 達德學院校友會編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11月
- (19) 同(1)
- (20) 據資料顯示，在1941年傑克已發表了數百萬字，單行本八種，且有人冒名偽作，可見其流行程度
- (21) 2002年9月出版，黃仲鳴著的《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》，是用心用力之作
- (22) 出版社及叢書編目，可見《盧璋鑒教授捐贈香港文學書目》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，2002年12月11日出版
- (23) 同(1)
- (24) 黃繼持先生卒於2002年2月28日
- (25) 見《文匯報》1949年5月19日，頁4
- (26) 例如李育中先生、戈陽先生送來早年年文藝活動合照，余麗璇送來「香港青年作者協會」聚會合照等等
- (27) 今聖嘆的照片就在1997年他去世後，我在舊書店雜物堆中尋得